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第130期

煮海为盐

大运兴沧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沧州东部盛产海盐。借鱼盐之利，舟楫之便，包括今沧州东部的齐国，成为“春秋五霸”之一。盐铁专卖制度的确立，为西汉迅速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。沧州盐业至今不衰，海盐的生产、管理与依赖海洋、大运河的运输，为沧州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12月13日，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，将以“煮海为盐 大运兴沧”为题，邀请有关人士在线上对沧州盐业文化进行探讨。

本次访谈，邀请的主讲嘉宾是地方志专家刘立鑫、学者孟建华、作家曹俊英。其中，刘立鑫是资深地方志专家，对沧州海盐有几十年的系统研究，他的研究成果、所采集的有关历史遗物多为文物部门和有关研究者引用。孟建华曾主持沧州东部尤其是海兴一代海盐的考古工作，几十年前就与刘立鑫一起，对古代盐场、煮盐灶户的遗址遗存做了大量实地考察。二人可谓沧州海盐文化研究的先行者。作为土生土长的沧州沿海人，曹俊英对制盐和海盐的历史，有着直观深入的接触和认识，关注生活、关注历史文化的作家视角，使她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触。

沧州东部曾发现大规模的煮盐遗址及春秋时期的煮盐工具“将军盔”，后来这片区域也因盐而得名盐山，至少在东周时期海盐的生产已经非常成熟，那么沧州海盐的生产始于何时？规模如何？有哪些遗物遗存？海盐是一种沉重的货物，以水运最为便利，内陆河尤其是大运河，以及海洋，是运盐的主要通道。水运畅通，沧州海盐行用四方，为沧州带来哪些繁荣？自西汉武帝时期，开始实行盐铁专卖制度，沧州盐业管理的进程如何？在沧州离海较远的盐碱区域，百姓也堆土晒盐，称为“小盐”，这是沧州海盐的一个补充，情形是怎样的？沧州制盐现状如何？盐业文化给沧州带来哪些影响？这些话题，都将在本期访谈中涉及，欢迎读者扫码入群参与互动讨论。

时间：13日上午
电话：18833783089

“文化八仙桌”系列访谈



主办：沧州日报
承办：沧州日报《人文周刊》

张之洞塑像模型昨日开模

青铜塑像将入驻国家图书馆



本报讯（记者祁凌霄）9日上午，由王春周设计制作的张之洞塑像模型，在南皮县寨子镇王厂鑄铜艺术馆开模。至此，这尊张之洞塑像基本定型，待翻砂铸造青铜塑像后，将入驻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当日上午，记者看到，王厂鑄铜厂的技师正用斧头敲打掉雕像的外范。随着范模的脱落，张之洞雕像渐渐呈现于面前。这是张之洞半身坐像，着朝服、朝珠，戴官帽，留长髯，凝视远方。忠于人物貌特征的写实之外，重点刻画了神态。人物深邃的目光里，能读出自强的力量和一代巨人肩负民族危亡的分量。

据了解，作者王春周是市文联副主席、美协副主席，中国壁画学会会员，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，南皮人。张之洞一生的勋业，从小影响着他。塑造张之洞形象，是他的夙愿。早在2010年，他就以泥塑、玻璃钢、鑄铜等多种形式，创作张之洞浮雕、雕塑近20件，雕塑头像、胸像、全身像12件。为设计这尊雕像，他用了数月的时间，参考张之洞的照片和资料，融入对人物的理解，推敲服饰、结构，雕琢面部表情，反复修改，九易其稿，精益求精，试做翻制了7尊大小不一、形态各异的张之洞像。昨天，泥塑翻制的玻璃钢模型铸型成功，顺利开模，长宽均为0.8米。模型成功翻制后，再翻蜡修正，然后翻砂铸造青铜塑像。

探秘瓮棺葬

本报记者 祁凌霄

随着今年9月末黄骅郭堤城遗址公园的开放，遗址公园内的瓮棺葬群进入公众视野，引来人们寻古探秘的好奇。历史深处还埋藏了多少文化的密码而不知为今人所知？大批瓮棺的出现，呈现了哪些穿越两千年的历史记忆？



沧州东部瓮棺曾大量出土

郭堤城遗址公园内，已清理出来的瓮棺葬有113座。这批瓮棺葬发现发掘于2016年5月，位置在郭堤城遗址西北200米处。

资料显示，113座瓮棺葬大部为南北朝向，排列无规律。有成人的，但以儿童居多，分幼儿和少年。儿童集中在发掘区西部，成人集中在东部。瓮棺有实用器，如釜、盆、甗、碗、罐等，也有专门烧造的冥具。葬具组合形式有20多种，包括两器组合、三器组合和四器组合。两器组合用两件陶器对接而成，三器和四器组合多是对接与套接并用，中间的器物多为筒形瓮或筒形器。

黄骅郭堤城瓮棺葬群，被国家文物局评为“2016年度中国重要考古发现”。而据当年考古人员的勘探，共有1000余座瓮棺葬分布在郭堤城周围。

如此巨大的瓮棺数量，可以用震撼二字来概括。

然而，近年来，沧州东部盐山、海兴、黄骅这片沿海区域，出土的瓮棺葬数字远不止这些。

《中国文物报》曾报道，在1997、1998年春秋两季，海兴县埕里村村民挖取古贝壳堤时，在村东北发现三处秦汉时期的古遗址和古墓葬群，少儿瓮棺葬有百余个。

2012年5月，海兴杨埕水库琅琊台附近的制陶废墟中，发现“兮”字印记陶瓮罐（棺）口沿残片。2009年春，这里还发现了与“卬”等字相似瓮棺残片。附近地区也曾发现同类瓮棺葬墓群7、8处共计300余具。不过多数瓮棺葬因为当时文物保护意识不强，被破坏殆尽……

历代挖掘破坏失载的瓮棺葬数量已不可考，但可以想见沧州东部沿海瓮棺葬数量之多，在全国也是鲜见的。

呈现战汉时期丧葬风俗

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，以瓮、盆为葬具，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。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，一般用两或三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。这种丧葬的发现，不独沧州东部，在北京、江苏等地都有陆续发现，日本也有。

黄骅瓮棺葬的瓮棺，最大的长约2.2米，由两陶釜和一陶盆组成。葬具底部一般钻有小孔，供死者“灵魂出入”。当年的考古专家从出土陶器特征分析，认定这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遗存。瓮棺葬群规模庞大、类型多样、分布密集，是战国秦汉时期具代表性的瓮棺葬墓地，也是国内发现数量最多的瓮棺葬群之一，对于深入研究丧葬习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。瓮棺葬群和郭堤城址并存发现，可进一步证明郭堤

解读依然迷雾重重

大量瓮棺葬在沧州东部出土说明了什么？是否与徐福东渡有关？与哪些古城关联？瓮棺葬给专家和地方文化研究者们带来了解读的困惑。

许多凝视瓮棺葬的人们眼中，呈现出徐福东渡的场景。

南北朝顾野王《舆地志》载：沧州高城县东北有卬兮城，秦始皇遣童男童女数千人至海求蓬莱不死药，筑此城以居之，号曰卬兮，汉因置千童县。2000年前的卬兮城究竟在何处？直到清代民国学术界仍各执其说。清代南皮学者叶圭绶说：“盐山县旧城即卬兮城也”；沧州张庆恩认为大山与小山之间沿海“界内有卬兮城”；同治年间《盐山县志》标注卬兮城在今黄骅东北六里灶；民国《盐山新志》记

城的年代和繁盛程度，对于探索瓮棺葬群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很有启发。

从现场清理和调查的情况看，海兴发现的少儿瓮棺葬的埋葬形式是：尸身由两个红陶瓮对口接平放埋葬在古贝壳堤中，个别瓮棺旁同时埋葬着一陶豆或陶小盆，瓮内除小儿骨骼和一两个小铜环外，不见其他遗物。通过部分较完整的瓮棺大残片拼接复原，瓮直径约34—52厘米，长65—78厘米，外部大都饰有绳纹，有的内底部还饰有太阳纹图案。专家根据清理三具瓮棺形制规格及14具盛装的少儿骨骼测估分析，瓮棺埋葬的

是约身高1至1.4米10余岁男女儿童，小铜环很可能是用作系结的“总角卬”。“总角”是古代儿童的代称，“卬”字象形，在两鬓角扎成发髻之状。

这是战汉时期的一种丧葬风俗，后来出现以施釉陶瓷大缸代替瓮棺的竖式墓葬，尤其是僧侣所常用，这在南皮、沧县等地均有实物出土。而日本幕府时代，僧俗也是这种埋葬风俗。这也可见中日之间源远流长不能割裂的文化交流和互相影响。

城周边地区在战汉时期有先民繁衍生息。倾向郭堤城应为齐国防御燕国的无棣城，建立时间为春秋战国时期，并进一步推测这里是徐福东渡集结之地。然而这种观点依然为时所质疑，有专家还提出这里曾是武阳城、徐福东渡没必要绕远再到这里出海的观点。

有人生活聚集，那么就不能避免疾病。医疗条件差的古代，幼儿夭亡并不是新鲜事，直到近现代至上世纪中期，还有集中埋葬夭折儿童的风俗，形成类似于乱葬岗之类的聚集地。当时每个村几乎都有这样的葬地，何况人口更为密集的城池周围，经过千百年的时间，日积月累，形成大量较集中的遗存并不稀奇。

徐福东渡集结地、无棣城遗址、武阳城后身、东渡海口等观点都有道理，那么找到直接的证据支持和证据链才是关键。拂去笼罩在瓮棺葬上的千年疑云，尚需时日。

王鹏：穿越历史认识张锡纯

本报记者 哈薇薇

全部收入囊中，竟有了93套之多，包括日本、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版本。他一直想找到头版，但未果，为这事，他还专门和北京中医药大学有关老师专家探讨过。对于1909年出版的说法，据他考证应是讹传，首次正式出版应该是1918年。他收集到的最早的是第四期《药理学讲义》，1924年版，版权页上印着发行处“沧州立达医院”。再有一套完整的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，伪满洲国时期，沈阳章福记印书局出版。还有1957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整套，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版。特别珍贵的，是他收集到了油印本、手抄本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这本书买不到，有人就刻蜡版油印，有人手抄。

沧州医专校长才晓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，想收录这批书，在学校做展区，供学生深入学习。令才校长没有想到的是，王鹏不收分文，欣然应允。王鹏说，只要是对张锡纯研究有益的事，他都愿意做。

媒体宣传引起连锁效应

2018年，王鹏在“文化八仙桌”微信群中询问：“今年是张锡纯的医学著作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付梓100周年，沧州有没有纪念活动？”6月3日，在清风楼举办第69期“文化八仙桌”，主题就是“汇通中西张锡纯”，而王鹏作为主讲嘉宾之一走到了台前。“文化八仙桌”上，他把自己考证的结果、收藏的版本，一一展示给大家，越来越多的沧州人开始知道张锡纯，而



及媒体共同召开《种菊轩诗草》茶会，分门别类地分析了张锡纯的诗歌。或忧国忧民、或医者仁心、或幽默风趣、或激昂愤懑，所有版本中的说法都是64首，但王鹏考证，不是64首而是93首，因为有的题目下是好几首诗。有的诗歌在排版时存在断句的错误，也有的在后续版本中被删除。而这些都影响今人对张锡纯诗歌的全面解读，这促使王鹏要重新编辑《种菊轩诗草》。

时不我待，说干就干。王鹏以1931年天津中西汇通医社出版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第六期为底本，以1941年中西汇通医社再版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第六期、

1941年奉天章福记版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第六期为参校本，由繁体竖排无句读，整理为简体横排加句读，并增补一些与张锡纯和诗的原诗，同时附民国医刊中张锡纯诗书影，便于读者对照阅读赏析。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已经基本整理成稿。

“每天看一点儿，每天多描画一点儿，让张锡纯的模样一天天清晰起来。王鹏的想法是编一部《张锡纯文集》，有他的思想生平医术，有他的诗歌他的一切。凡是研究张锡纯的人，都能在这里找到资料。这是一个大工程，也许5年、也许10年、也许一辈子。他要向世人展现一个有血有肉、医德高尚、人格伟大的张锡纯。”王鹏说。

纪念张锡纯诞辰160周年系列报道